

政戰名將錄

裘 軫

方覺慧是老革命黨

民國十三年 國父在黃埔創辦陸軍軍官學校，是要將國民黨的中心思想，三民主義，播種在軍人的頭腦裏，而後發揚光大，普及於全國。這一創舉在當年是劃時代的宏謀大略。過去軍隊承襲專制時代的餘緒，軍人祇知服從直屬長官，不知其他。北洋軍閥祇要求軍人頭腦簡單，武藝高強，成爲私人作威作福，據地自雄的工具。國父認爲這一舊觀念必須從根剷除，做革命軍人必須心中自有主宰，能明辯是非邪正，大家爲國家利益，而戮力同心。唯有如此，才可完成順天應人，合乎時代潮流之革命大業。因此黃埔軍校特設與校長權力相等的黨代表，也即是國軍之有政工的起源。民國十五年七九廣州誓師北伐，在北伐軍總司令部有總政治部，各軍師均配置政工組織，總負責人是鄧演達，鄧才氣縱橫，練達有爲；但在寧漢分裂（民國十六年春）時，他受共黨分子及蘇俄顧問鮑羅廷之影響，偏向漢方之汪

精衛，因而被黜身亡。當時政工情形，沒有中堅力量，一片混雜，因共黨份子借國民黨軀殼，孕育自己的胎胞。國民黨嚴厲的採取清黨措施，各軍師部隊長都物色與自己可以合作的人來辦軍中政工業務，黨中央壓根兒沒有權力可以過問。民國十六年初，東路軍總指揮是何應欽，最先進入上海市的是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是潘宜之。潘到了上海那樣的大都市，要展開工作，需要很多幹部，於是借用盧家灣的法政大學校址，（該校爲徐謙創辦，與蒲柏路的法政大學並非一校，法政大學是潘大道（字力山）所創辦，潘遇刺殞命，由董康接辦，後遷江灣，改稱上海法學院，則由褚輔成（字慧僧）沈鈞儒所接辦。法政大學以徐謙與共產黨人士接近，乃由留法女博士鄭毓秀爲校長，（鄭後來嫁與魏道明博士）。創辦黨務人員訓練所，招生五百名，招考的方式，祇填十幾題的測驗表，例如爲什麼來應考？答案是參加革命行列。當時上海青年都熱烈希望參加革命工作，應考的特別多，大約有

三四千人，而辦理招生的人手不夠，測驗題又淺顯無法評定優劣，便按報名次序錄取，還特別加收備取二百名。但訓練期間僅爲六週，實在學不到什麼，又遇上清黨的大變局（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可憐青年們搞不清自己究竟是國民黨，抑是共產黨，糊裏糊塗聽憑他人擺佈。不久潘宜之又調離上海，黨務人員訓練所也祇是曇花一現罷了。可是軍事主力的北伐軍總司令部，在清除鄧演達所領導之軍隊政工以後，亟需建立以三民主義爲中心思想的政工系統，乃在南京開辦政工人員養成所，借用三元巷河海工程學校舊址，招生一千名，考試非常嚴格，報考資格，限於在學肄業之大學學生，考試科目是黨義、國文、英文、數學四項，試卷採用密封，初試在上海，初試錄取又到南京複試。當時規定的訓練期間是三個月，主持該所的負責人是黃開山，教務主任是史維煥，政治教官都是上海著名的教授借調兼任。軍訓教官都是保定出身。區隊長之類延用黃埔出身，曾稱一時之新氣象。但開學僅僅二個月，時局發生變

（47）

化，先是蔣總司令下野（十六年秋間），接着是孫傳芳負隅江北，渡江猛撲，而有龍潭之役。當時政工人員養成所無法領到經費，臨時決定解散，提前畢業，發給畢業證書，遣返上海各歸原校繼續學業。到了民國十七年春初，蔣總司令東山再起，部署第二次北伐，總司令部即設在三元巷河海工程學校舊址，總司令部又設政治訓練部，發表吳稚暉為主任，副主任有三位，一是陳銘樞，一是方覺慧，一是劉文島。吳未就職，陳銘樞亦不常到部，實際負責人是方覺慧，字子樵，湖北蕪春人，是同盟會老革命，作風溫和，人稱好好先生，為國民黨中委之資深人士。

申傲霜作民衆宣傳

當年政治訓練部設在戶部街一所教會洋房，方氏認為政工人員養成所那批學生，素質很優秀，決定組織北伐宣傳總隊，以黃埔第一期出身山西籍的申傲霜為總隊長，下設三個大隊，每大隊分三中隊，隊員都是上尉待遇，召集前政工人員養成所畢業人員來擔任。北伐宣傳總隊出發到徐州以後，以分隊為單位，配屬各師隨軍行動，他們的任務，祇是對民衆宣傳，對士兵的政治教育則尚未着手。第二次北伐從徐州出發攻擊，滕縣、鄒縣、滋陽、大漢口次第收復，攻佔濟南時，日本駐軍藉故啓釁，槍殺我外交特派員蔡公時，出兵佔領膠濟路沿線，即所謂濟南五三慘案。惟我中央決策，以完成北伐統一全國為主要任務，避免與日軍衝突，仍渡黃河，攻打德州滄縣。東北軍統帥張學良見北伐軍已威脅平津，立即宣佈

易幟，服從國民政府。民國十七年十月十日北伐軍進入北京，宣告北伐大功告成，因而軍隊復員，召開全國編遣會議。北伐宣傳總隊在此種情況下宣告解散。在此時期政府勵精圖治，從事各項建設，並大力整飭政風，不允許官吏私德有虧，江蘇民政廳長辜仁發曾因妻妾鬧成風波，為報紙揭載，上峯立即明令撤職。這期間張治中亦有風流韻事，他的公館在沈舉人巷，延聘美艷端莊之翟宗輿在家担任家庭教師，時間一久，就發生私通情事，旋為元配當場捉住出彩，元配是窮苦出身之鄉婦，壯健有力，當時哭鬧扭打不可開交，張即警告其妻道：「你若不要我做官了，你儘管鬧，辜仁發是先例；如果你還想享榮華富貴，就得聽我的安排！」張妻即提三個條件：一、遣走小蹄子，不再聘家庭教師。二、永遠不許有小太太。三、到什麼地方去都該帶我同走。張自然全部接受。翟宗輿被撫慰，派在軍校圖書館充中尉管理員，二年之內，張為之擇配遣嫁，對象是軍校安徽籍的一位四十餘歲的上校政治教官文聖舉，事先由張向安徽省主席陳調元（字雪暄）力保

文聖舉為縣長，明令發表時，張給資十萬元為陪嫁，婚禮大大地鋪張一番，然後走馬上任，翟宗輿為縣府秘書，一時傳為美談。這一時期，軍校始終有政訓處，黨務特派員制未嘗在軍校施行，黃埔遷校到京，政訓處長是周佛海，周當年正印行三民主義理論的體系，大出風頭，對軍校政訓處長一職抱大才小用之心情而求去，繼任的是鄧梯，字力餘，湖南湘陰人，黃埔一期出身，他受黨國元老胡漢民譽為黃埔同學之佼佼者，得由江

蘇省黨務特派員調任軍校政訓處長，掌理政治教育及生活訓導，他以廿七八歲英年，得膺中將級職，可謂少年得志。他意氣昂揚，張治中也對他禮讓畏懼他一點，因為他若有意見，可以直接向校長請示。

蔣堅忍主持宣傳總隊

在民國十九年春夏，中央討伐閻馮時，也曾編組討逆宣傳總隊，總隊長是蔣堅忍，工作頗有表現。這時政工系統仍然未有確立，主要原因是經費沒有獨立，是配屬各部隊經費之內，部隊長為了省錢，不願多化費在軍隊政訓之上，有少數人員點綴罷了，上面也沒有政訓專責的指揮機構。民國二十年九一八瀋陽事變之後，全國學生大請願，要求政府對日宣戰，當時國府主席蔣公衡量局勢，對日宣戰可能招致民族萬劫不復之地步，寧可個人犧牲權位利祿，宣佈再度下野，喚起國人團結禦侮。民國廿一年一二八淞滬抗日事件以後，蔣公東山再起，專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府主席由林森担任，行政院長由汪兆銘担任。）才有總政治訓練處成立，由黃埔一期出身之賀衷寒主持其事，地址是在南京明瓦廊，又值黃埔同學為中堅之新興革命組織力行社，復興社開創活動，互相配合發展，所有政工人員均由總政訓處統一委派，總政訓處委派上校以上之政工主管，應先報經團體幹部會議核定，這樣的人事選拔，完全排除人情請託之鑽營，祇須有真才實學，工作表現良好，就能出人頭地施展出來；同時各部隊之政工人員編制，經費都是獨立，由總政

訓處掌管統籌，賀氏湖南岳陽人，黃埔一期畢業後，曾赴俄國中山大學留學，亦曾於民國十八九年，在日本短期遊學，他雖為中將級職，但風頭之健，超越名公巨卿之上，手下將級人員就有數百人之多，儼然成為黃埔同學新的領導巨頭。那時他卅餘歲的盛年，英氣勃發，精力充沛，他的演講錄，曾印行一冊「一得集」，在當時頗能獲得讀者好感，賀氏對人熱情友善，負責盡職，剛正不阿，處事明快，決疑善斷，又懂得組織運用之訣竅，確屬上駟之材。國軍雖自北伐出師已有政工設施；但紛歧混雜，功效不著，甚至給官兵留下壞印象，譏為「賣膏藥」的伙計。到賀氏主持全國軍隊政工，才形成政工人員在軍中的堅強陣容。在工作方面，他有很多創新獻替：掃除軍人頭腦必須簡單之陳舊觀念，充實官兵的智能，使能判別邪正是非。培養愛國情操，「國家」不光是一抽象觀念，而是具體微妙，使人可以接觸領悟的有機權威！「國家」言，以練唱國歌，大行其是；「國家」有榮譽的體面，以升降國旗為崇敬。「國家」有頭腦的中心主宰，提出擁護領袖，服從領袖之要求。因此在軍中普遍推行升旗，朝會講話，早晚點名，檢討問題，這些措施在今日看來並無新奇；但在當年教育尚未普及，文盲佔絕大多數的社會，確是劃時代應局勢之適切新獻，這便是他組織智能之運用，猶似工商業企劃管理才智適時肆應，有學識的人，不一定都具備組織能力，大學教授學有專長；但治世未必是能臣。中國學識權威如孔夫子，就其組織能力而言，遠不及管仲治齊之有成就，亦不如墨翟實事求是

賀衷寒氏朝氣蓬勃

，身體力行為天下先。賀氏當年睥睨一切，足堪稱雄。

當時中央的最高決策，是以黨治國，實施訓政，安內攘外，集中意志，厚集國力。安內的首要，是圍剿江西的赤匪。朱毛在民國十八年，由江西省府主席朱培德屬下特務團為基幹，拖上山，在井崗寨起家。師長張輝贊率部進剿，反被生擒，慘酷處死，因是匪勢大張，並以打土豪，分田地，策動農民起鬪，在贛南瑞金，利用贛、閩、粵邊區，成立蘇維埃政府，中央雖派大軍撻伐，此去彼竄，或化整為零，混匿民間，難收清除之效。又以贛南山區交通不便，大軍所至，補給無法及時趕到，反易被匪乘隙蹈虛，備受困擾。因此南昌特設行營，最高當局親臨勦辦，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編組保甲，推行新生活運動淨化禮義廉恥之道德規範，努力掃除文盲，軍中辦識字教育，駐地辦民衆學校，不收任何費用，還免費贈送教科書，文具紙筆，更難得的提倡雙手萬能，要辦的事，不能因為缺少經費而不辦，必須想出辦法克服困難，達成任務，例如舉辦民衆教育，政工人員兼充教員，書籍文具等可由總政訓處頒發。可是學校必須有課堂，當時戰地縱有祠堂寺廟可供利用，也多破損不堪，政工人員便在軍中選派會做過木工、泥水工之兵士出動修葺，沒有桌椅，收集磚塊砌成一排排案桌代用，座位亦是土磚疊置，加上一個草墊，沒有黑板，便在牆上用桐油石灰墁平，再塗一層黑漆。總之，軍

行所至，如果有十天八天的駐留，就得設立這樣的民衆學校，民間七八歲幼童乃至十五六歲的不識字少年都得應名入學，部隊移防，交給接防部隊，無接防部隊便交給地方鄉保長繼續辦理，由總政訓處撥款補助。這種措施，在識字教育之功能而言，未免緩慢；但在人的作為上灌輸積極進取之精神價值，是有其無比之重大意義，受過了這類學校教學的青年人，到抗日時期都已成為二三十歲的壯年，他們樂觀奮鬥，意氣如虹，今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在贛縣任專員時，曾在著作中憶述當地青年之奮發有為，我們可加一註解，這些歷經戰亂，在斷垣殘瓦中重整家園，他們對於應變已有堅強之信心，這不能不歸功於政工從事民衆教育之成功。

賀衷寒另一重大貢獻是倡導環境衛生，糾正士兵變態心理。當年尚未實施徵兵制，兵源都由招募而來。那時我國受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之迫害，關稅不能自主，外商不但可以運銷洋貨於全國各地，還可在內地任意設廠，以廉價勞力為外商增產賺錢。此種經濟侵略所加於我國之壓力，已使我們農村破產，浙江是比較富庶的省份，以一個中等縣全年生產總值，如稻谷麥粟，副業如絲繭茶葉牲畜等，統統累計的數字，尚抵不過該縣全年輸入捲煙，洋布、洋貨之消耗，這樣自然造成資金外流，農村經濟枯竭之現象，勞力找不到工做，農民為了應付紳豪種種剝削，不得不將田地出賣於人，在此情況下，稍有血性勇氣者，不是挺而走險，做盜匪，便遠走他鄉應募當兵。這些人有一肚子怨氣，當了兵便以為出人頭地

，從前受人迫害，如今也可以仗軍隊的權勢，欺壓他人，在心理上趨向變態，在戰地找不到出氣的對象，土豪劣紳，大都為共匪殺害，不被殺害的也早逃往安全的都市謀生，他們便以毀壞房屋器物來洩忿。我軍雖嚴令查禁，但收效不大。後來政工人員研討結果，祇有施行心理校正，凡部隊所到之處，立令從事修橋補路，闢建花草園地，茅亭池塘，雖非治軍作戰要務，而於官兵之精神訓練，頗有益效。因為士兵親自建造之手蹟，如果有人毀壞了它，定然大動肝火，推己及人，加上上峯禁止任意毀損民物，於是得以培養成實質愛民之風氣。

代理路屍四十銀元

至於環境衛生，過去並無環境衛生之名詞。祇因我軍在贛中山地，水土不能適應，瘧痢病患太多，一連應有百餘人，而實際能參加作戰的往往僅有三四十人。而他們致病之由，多是不注意衛生，滿地蒼蠅飛舞，伙夫處理膳食，不合衛生條件，官兵隨地便溺，細菌播散，更有倒斃路旁之屍體，未及掩埋，一陣雨水，將腐屍毒菌沖流，士兵在田汧山澗取飲，沒有不生病的。又因贛省土性水質特殊，患了瘧疾、痢疾，大多無救。軍中有：擺子（即瘧疾）夾痢疾，不死不肯歇之警語。當時醫療機構亦不健全，藥品奇缺，抗生素尚未發明，官兵患花柳病為數亦多，軍醫院規定不備治性病之黃色素，（九一四）及梅毒剋星一類藥品，戰地民間逃散，市廛為墟，西藥房本來已不多，在此時患者更無法自資買得到。政工人員感

於此種消兵力之無形敵人問題，比衝鋒陷陣之作戰傷亡更為嚴重，又得深入檢討挽救，他們絕不是像今日迷惑於美國方式，要錢要藥，從醫療健全的途徑去謀求解決，他們本於雙手萬能，沒有錢也得想出辦法來，天下無難事，祇要有心人的精神氣概。他們的結論是勵行講究環境衛生，凡部隊所駐之村落，全體出動打掃洗刷，敷石灰，用黃泥石灰水塗刷所有家屋，絕對禁止隨地大小便，違者處罰多做苦工，民間舊毛坑一概廢棄，重建一公尺深之廁所，旁置清砂一堆，便後順

手取砂掩蓋，備辦大批吸蠅紙，打蠅拍免費散給軍中使用，吸滿死蠅之蠅紙一張，可以向政工人員駐所兌換食鹽二兩。（戰地食鹽黑市高到一塊銀元一斤，也無法買得到，因當時對匪經濟封鎖，江西不產鹽，政府控制極嚴，軍用不准私買外流，民衆由村里保甲造具名冊計口價領，亦常因交通阻滯，供應失常，任何人領得吸蠅紙，便等於無價買到食鹽，免除淡食之苦，如此從事滅蠅，收效迅速確實。廚房的伙夫，洗澡、剃頭，剪指甲，均有特別規定，並製發伙夫工作服，每日換洗，任何食物碗筷均加紗布蓋罩，上級檢查內務，先看廁所，再看廚房寢室辦公處所。部隊行軍政工人員率領各單位派出副官打前站，沿途給資民家燒茶水，設置茶水站，並於宿營預定地分配駐區。沿途如有路屍，不論死者為軍民，祇須取得當地保甲長證明，而予掩埋，可向政工單位請領四十銀元之葬殮紙錠費，四十銀元在當年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即使買口薄棺，也不過幾元錢，紙錠石灰等化費，用不了一元。因此，人人都願意

找路屍代為埋葬。國家化費四十元獎勵掩埋路屍，也許有人認為太浪費；但在政工人員想法不同，他們認為抑制疫癘蔓延比什麼都重要，部隊開拔之後，過去都是一走了之，什麼都不管，如今政工人員檢查駐地清潔，借用器具門板之類是否清還原主，如果查出那一單位沒有做好，立即報請首長加以處分。

當時政工人員更能針對現實，不斷提出新的標語口號，例如：「蒼蠅如老虎，先打老虎再打敵人！」「小心！我們的敵人潛匿在茅廁廚房！」「死於無形的敵人是恥辱！」「清除無形的敵人，人人有責！」更可貴的政工人員不重視教條式的黨義灌輸，他們常常採取活用，啓發士兵理解領悟，他們會說：「你們當兵上了火線，隨時有陣亡的可能！你們手中有槍枝，為什麼不到銀行去搶錢，即使失手被捕，也不過在刑場飲彈而亡！同樣是危險，不去做匪盜，而來當兵，這就是你們的愛國表現，為國家出力，而不自知，如今知道了，能為國家出力的人是榮譽的！」他們也會說：「中國積弱是滿清政府北洋軍閥竊國自私的結果，受外國不平等條約的束縛，經濟侵略的壓榨，使我們農村破產，民不聊生，現在挽救的辦法：安內必先滅共匪，攘外必先打日本！」他們對於逃兵問題所持之說法：「有的士兵想臨陣脫逃，那是自找死路走！要知道逃得最快，總沒有敵人子彈飛過來的快！即使不被擊中，還有各級長官監制，也不會讓你逃走！即或逃離前線，遇上別隊或憲兵盤查，還是法網難逃呀！」關於激勵訓練方面，他們會從統計數字上來分析的

說：「你們每次戰役終了，呈報斃敵傷亡是多少多少，另一統計消耗子彈又是多少多少，兩相比照，平均十萬發打中一人，這是訓練不够理想的明證。再說六七年間一次一次的圍剿，若依據各師部隊所報斃敵傷亡數字，累積統計，竟超過三百萬人，果真如此，贛南匪區連一個人也沒有了，敵人爲何如此頑強，足證各部隊所報數字靠不住！」以上都是舉例而言，他們所做的實事求是還多得很！

在贛南國軍屢次進剿，匪敵給我們的困擾，也是艱苦之至。我們雖然打了勝仗；但因匪方挾制民衆，對於堅壁清野的工作做得很澈底，使我們無法得到食物，不能不自動撤走到補給能到達的地方。匪軍利用民間老弱難民給他們做情報，軍隊移動，戰地沿途難民自然很多，老弱男女在路旁坐臥呻吟，亦是常事，我軍官兵不加留意，他們在聽士兵的談片，也注意走過隊伍的詳數，更有我官兵向路人詢問到什麼地方還有多少里，難民就知道了這一部隊向何處開。他們將看到的聽到的都默記在心裏，直到部隊全部走完，難民也起身走動，在附近一定伏有年壯之匪諜，匪諜聽取難民報告，便迅速的奔競，穿山越嶺，仗着地形熟悉，專走小道捷徑，比大部隊行軍快速得多，我軍尚未到達目的地，匪軍頭目已先知道我軍企圖，立採應付之方，如來勢強大，他們便迅速轉移，讓我軍撲個空。若是小部隊一團一旅，他們便埋伏在適當的處所，橫加襲擊。戰地農村，若在匪軍防守之線內，會在三四里視野之內，選擇高處豎立一枝長竹竿，竿頭縛一竹箕一類的小

器物，旁有三五小孩在戲耍，我軍尖兵搜索前進，小孩們仍像戲耍一樣，故意將竹竿放倒，給村頭匪軍崗哨望見，知有情況，立即傳警戒備。匪軍又有遲緩我軍行動的鬼主義：我部隊開拔，一定在拂曉之時，而在未出發前之一二日，匪諜已從民間探知此一部隊將向何處移動，於是匪方會將土製過山砲彈，安放在大路之旁。這種土製砲彈是用一段松木挖空，填充土造火藥，包以白鐵皮，有一麻繩作引線，砲放在路邊數尺之遙，引線則橫按在路上草叢間，我軍在天未明行動經過

，不知有麻繩拉在路上，一經繃牽，土砲向路心爆破，殺傷力甚大，傷亡一二十人雖不算什麼了不起；但可使我軍感到草木皆兵人人都感到腳下有鬼。因此我軍對策，不走大路，改走大路旁之田野，匪又改良辦法來對付我們，所謂田野，即使是民間種的農作物，我們也不管，照樣踐踏而過，未種農作物，則野草萋萋，他們會放置竹板，板上釘滿銳利之釘，誤踏其上，腳背爲之穿。當然這種竹板，並非到處皆有；但在一二十里內如發生三五起，已達其遲緩行動之目的。匪方準備放棄之村落，他們也會留給我們許多困擾，匪方亂貼標語是常事，我政工人員自應將此類反動標語撕毀，或塗刷清除，他們常在牆間鑿一孔，暗置土製小爆炸藥，引線就粘貼在標語紙上，你去撕扯，牽動引線，爆炸物向你頭上開花。桌椅傢俱，我們需要使用，你一動它，桌腳可能有引線，埋在土中的火藥又爆發了！也不是處處都有，發生一二處已够使人驚心動魄，疑神疑鬼了。我軍爲了找尋糧食，匪方則常將糧食埋置地下，

又安置土製爆炸物傷人毀了糧食，迫使我們放棄發掘埋於地下之任何食糧。（下期續完）

袁世凱傳 一代梟雄

章君毅著 定價叁拾陸元

全書廿萬字，三百餘頁，分裝兩冊，合售叁拾陸元。

還俗記 鈕先銘著

全書二十餘萬言，三百餘頁，附以珍貴圖片。內容精彩，百讀不厭。定價貳拾捌元。

六十年來的中國

王成聖著 定價伍拾元

本書詳述中華民國開國迄今之全部史實，體制完備，立論謹嚴。平裝定價新台幣伍拾元。

傳記精華（第一集）

鈕先銘等著 定價伍拾元

本書精選名家鈕先銘、齊良憐、盛李蕙芸、趙淑敏、徐慎緘、李郁塘、王成聖、章君毅等傑作十二篇，篇篇引人入勝。

購買以上各書請撥電話七二四八〇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立即寄書